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学而思

何为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对历史荣耀的一次回归之旅，复兴本质上是关于人的价值理想不断实现的过程，终极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追求和接近。

□ 温小勇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复兴”是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我们的民族曾经有过兴盛辉煌的历史时期。

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史学家和政治史学家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当中指出，“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4世纪以后，虽然欧洲的人均收入慢慢地超过了中国，但是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快。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也提到，“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在15世纪时，中国人口众多，有1亿—1.3亿，而当时欧洲的人口为5000万—5500万，它的文化灿烂辉煌，平原土地肥沃，灌溉发达，与11世纪开凿的蔚为壮观的运河系统相连，并形成了一个由受过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管理的统一的等级制政府，这一切使中国社会发达具有一种内聚力，以致外国来客羡慕不已”。可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构建并不是毫无历史依据的妄自尊大，也不是中国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有着深刻的逻辑与历史高度统一的价值判断。从此意义上来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正是对历史荣耀的一次回归之旅。

如此，是不是说实现了经济上的“更先进和更优越”，实现了整体社会成就让“外国来客羡慕不已”，也就实现了民族复兴了呢？有学者据此推演出了民族复兴的完成指数，“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即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这比2005年民族复兴指数（0.4644）大幅提高”。也有学者设定一系列指标为国家做健康指数“体检”，“2011年中国国家健康指数（NHI）在100个样本国家中列第11位，高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发达国家，居‘健康达标型’国家之首”。但是，这样的对复兴的预期和设定均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人对于发展的价值认识；社会整体进步的最终判断标准也应该是人的价值观念的提升。如果忽略了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人这一命题本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旅程也就偏离了方向和轨道。因此，考察民族复兴这样的宏大主题，还须从国家前行、社会进步以及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的价值方向入手。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双重推进的进程中，考察国家、社会以及公民的核心价值观的演进和变迁，即人文精神的复兴状况，从而让民族复兴有了可以寄托的根基和达到最终目的的归宿。

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设定的对既定目标的追索途径——以修身为本，《孟子》中讲“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育和践行路径上暗合了传统价值观的“知本”之道，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较为系统地构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价值观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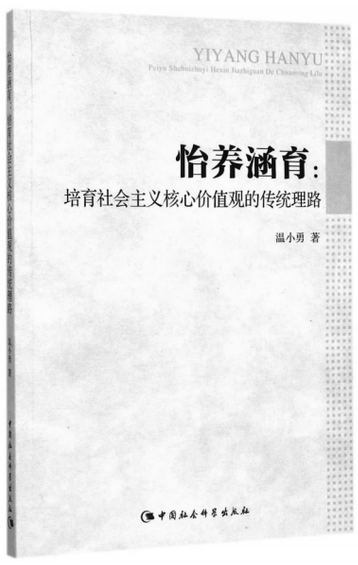
在公民层面，核心价值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不正是“修身”之本吗？没有可爱之国、没有可敬之业，个体的身心很难保证“如一”；没有诚信的保障、没有友善的氛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难保证和谐。因此，国家和社会要致力于让每个公民有可爱的国、可敬的业，有诚信的行为保障、有友善的人际氛围。作为公民个体，更要积极响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和培育，从思想到行为都要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修身”之本，便是在推进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尽己之力并奉献其中了。

在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不正是传统价值观认定的“齐家”之本吗？如果在这个“家庭”内部，没有自由的权利、没有平等的地位、没有公正的理念、没有法治的约束，有的是专制高高在上、特权处处横行，那么，这个“家庭”不论多富有、多么金碧辉煌，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理想之所吗？因而，全社会在党的领导下，落实宪法赋予的真实的、广泛的自由，消除妨害平等的障碍，达成社会公正的共识，构建全面的法治，便实现了“家齐”，也就向民族复兴的征途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不正暗合于传统价值观设定的“国治”之本吗？有了富强的国，遍及世界的中国人才能挺起腰杆；有了民主的国，才能在风云变幻世界舞台上立足；有了文明的国，才可以对得起数千年“礼仪之邦”的美称；有了和谐的国，才可以致力于团结各方面力量实现伟大复兴。走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路，也正实现了传统价值观中的“国治”，民族复兴也就有了参照和样本。“国治而后天下平”。如果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实现“国治”，并且有前面的“家齐”和“身修”为依托，全世界自然“天下平”。那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福祉，而是全人类走向和平美好未来的重要依靠力量。

伯特兰·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说过，“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

如果说，在经济力量对比上的复兴意味着一种历史回归，那么，在人的发展上的复兴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越——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价值理想不断实现的过程，民族复兴的终极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追求和接近。



书而思

群体性事件治理如何“守门”

□ 刘炳香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群体性事件已成为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形式。很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关注，并进行了多维研究。陈秀梅教授所著《冲突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与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性研究》一书是其中的优秀之作。

该书以严密的逻辑分析论证了群体性事件和利益表达二者的因果关系，从利益表达视角探寻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分析影响利益表达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因素，找出利益表达机制低效或无效的体制根源，并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性进行考察，揭示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益表达运作方式对我国的启示，对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性评价体系进行设定，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利益表达机制有效的对策建议，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最后达到构建和谐安康的社会价值目标。

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视角独特。陈秀梅教授在该书中选择了一个新的独特的视角，即把群体性事件与利益表达的有效性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以“有效性”为核心，对利益表达的“有效”和“无效”进行界定，就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机理和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性进行横向与纵向考察，提出的一些观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我国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几乎都与群众的利益紧密相连，与群众利益无法实现、利益诉求无法有效传递息息相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来自于利益矛盾，而非来自利益表达；如果制度化利益表达低效或无效，公众随时有可能选择非制度化或暴力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反之，如果制度化表达程序有效并且畅通无阻，各种利益表达依法进行，就能够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效缓解社会紧张情势；当公众利益受到损害，或者意识到自身利益诉求需要表达时，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过程就开始了，一个完整的利益表达必须经过组织裁剪，政治系统认可，利益要求的易读性和整合性得到提高，才能转化为政策输出，公众的利益诉求一旦在政策输出中得到体现，说明利益表达是有效的，如果利益表达没有经过组织的认可，或没有进入政治系统，有的即使经过政治系统，但最后被政治系统内“守门员”缩减掉，最终没有形成政策输出，则说明利益表达是无效的，等等。

在理论研究与现实考察基础上，该书中有的放矢地提出一些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政策性建议，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例如：构建一个公平、开放的利益表达机制，为不同群体提供公平表达利益的制度平台，保证社会秩序良性运行，保障群众根本利益得以实现。为此，必须构建利益表达培育机制，塑造合格的利益表达主体；建立评价反馈制度，强化利益表达客体的回应理念；构建利益表达实现机制，充分发挥人民代表、人民政协及各类社会团体的利益表达功能；构建利益表达规范机制，强化媒体功能的发挥；完善法律制度，构建利益表达保障机制，等等。

该书第二个突出特点是视野开阔。一方面，作者以党校教授的政治敏锐性与国际视野，在该书中大胆将群体性事件与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性放在政治文明的大系统内进行研究，通过中外比较，找寻差距，吸收精髓，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作者在该书中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问题置于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予以考察、研究和思考，基于作者长期的扎实的实地调研和案例积累，该书中选取并剖析了诸多实践中的典型案例，这使该书对群体性事件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对策探讨视野更广阔，也更加生动、鲜活。

此外，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不仅逻辑缜密、观点鲜明，而且在语言表达方面，也是难得的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这不仅会使群体性事件治理方面的理论研究者，也会使具体实践者对阅读该书感到饶有兴趣，从而为学术研究成果更广泛地被认同、被应用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书海泛舟

反腐倡廉的历史镜鉴

——读《中国历史的教训》

□ 曹颖新

人人都喜欢照镜子，对此现象，心理学有所解释：因为镜子可以让我们在意识层面直接感受到自己的客观存在，这样我们才不会慌张焦虑。同样地，我们也需要看到自己的间接形象，间接形象则是通过以往知识谱系形成的思想映照出来的，而历史就是这套知识谱系。看历史，是为了看见历史中我们的真实形象，这样，我们才能消除焦虑，从容前行。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口号形象有力，凝聚共识，但如何操作，则需要群策群力，聚合大智慧。中外历史就是一个提供智慧的宝库，从历史中可以借鉴经验教训。

《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包括24篇历史杂谈。作者习骅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多年，对导致腐败和推行廉政的制度因素和人性因素都有深切的体察，而这些因素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影子。鉴往知来的忧患意识和接驳古今的趣味心理促使他写下一个个历史故事，从这些故事中，读者既能体味历史人物幽微的内心，又能领略每个时代复杂的环境，最能引发读者思考的是为何很多相似的故事屡屡上演，只是换了主角，继而思考如何跳出历史教训。

在回答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前，这本书深察腐败形成的土壤，包括中国的传统积习，人性中的固陋等。同时用生动的历史故事，分析制度须怎样运作，才可以与人性共舞，实现我们古人的一种治理观，即达到君子与良法共同推进郅治的效果。

这24篇文章，有一部分写了开国明君和中兴之主的良苦设计，也写了一些良臣能吏的大义担当，比如严格限制官二代参加科考的赵匡胤、动用非常手段兴利除弊的雍正，比如凭自身正气和智慧创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汤斌、用现代海权思维力争国家主权的吴大澂。

在政权创建之初，前朝败亡的教训锥心刺目，创立政权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明主，他们经验丰富，目光如炬。比如赵匡胤，虽然是靠军政权夺取天下，但他深知军政权不足以诠释合法性，就像欧阳修对“正统”下的定义：“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从周朝开始，为了矫正殷商的暴虐，就主张以德配位，一直到唐朝，唐人主张要直接接续周、汉道统，也就是以德为正的传统。在这个思想脉络中，贯穿始终的，是在合法性的序列中，把“正”排在“统”之前。“正”是以君子之仁德承接天地之仁德，获得了天地和百姓的认可，才成为君子之德，这个政权才具有合法性。所以宋太祖和宋仁宗，对天地和百姓，尤其是对生产和延续这套正统观念的士大夫，才心存敬畏，因为他们认可手中的权力来自于这些敬畏的对象。心里尊重，重在实施，宋朝在加强文治、制约皇权、平衡中央和地方权力、以经济繁荣缓解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等各方面，都体现了这种尊重。

本书中另外一部分篇章，呈现了大量明清官场的弊病，比如行政效率低下，官员唯上是从而欺下、唯利是从而瞒上，官场里满眼都是贪官、庸官、懒官、巧官。有奕劻这样的“交际花”，有曹振镛这样的官油子，还有陈演这样的闷葫芦。再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些典型不仅在明清有之，在历代官场中都不乏其人，确切地说是普遍存在于王朝末期的官场中。

为什么这些官员会扎堆出现，因为就像书中说的，“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到了王朝后期，一些良好制度运行不再顺畅，钻制度空子的成本越来越低。从皇帝到大小官吏，守成思想渐生，因无能而抱残守缺，因贪图私利而采取鸵鸟政策，这就产生了庸官、巧官，庞大的官僚体系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这样的政治环境，几个贪官就可以加剧腐败，何况巧用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大，越来越顺，这样的示范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积重难返。官员的功夫都用在哄好上级，巧瞒上级，因为各级官员的权力均来自上级。书中说，“当官位爵禄都成为大肆买卖对象时，官场会呈现塌陷式反应”。如果上司能保守官位永固也可以，问题是，即使是皇帝，如果把权力仅仅作为满足一己私利的工具，那他也不能保证合法性永固，何况是一个政权中的官位。

在中国的王朝时代，每逢朝代末期，土地兼并、军事割据、官场腐败、流民四起，数症并发。一个重要原因是各阶层利益严重分化，不平等现象尖锐凸显。这时，应该去除特权，缓解因权力集中和分配不均而造成的不平等，但是，在过去，没有一个政权能真正认可权力来自于广大民众，权力天然地向上集中，向少数人集中，这个趋势会随着制度笼子的松散越来越严重。书中《慈禧收礼》这篇文章，生动地讲述了为了权力平衡的需要，连慈禧也很无奈，甚至无法封住已开的口子。如果治病于未病，这种四处掣肘、无从下手的局面就不会发生。

再加上王权时代缺乏共治的传统，缺少阶层对话机制，利益群体之间缺少协商机会，无法用和平方式聊天，最后就只能诉诸武力，后果就是政权被武力推翻。这是古代政权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一部分原因。但是，不能强求古人，民主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人民观，都是现代观念和思想。在古人那里，没有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条件和实践依据。

书中有一篇文章《共产党是如何“买通”陈嘉庚的》，里面有一段话：“得人心者得天下，看似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阐释。但国民党之所以毫不在乎人民怎么看它，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心存敬畏，作风清新，差异来自‘我是谁’‘为了谁’这个本质问题。”我是谁、为了谁，答案的不同，决定了共产党和以往政权的本质区别。早在苏区治理时代，中国共产党就带给人民以阶层平等和经济自由，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有这样的成就，让全中国看到希望，人民怎会没有选择？始终清楚我是谁、为了谁，实际上是始终保持防患于未然的心态。自觉是一个天然的净化器，是最有力量的反腐之剑。

书中另一篇文章《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里面的笑话让人不禁捧腹。有一个笑话是：“一个乌克兰人被叫到克格勃。问：你怎么经常收到以色列的邮件？答：二战中我藏匿过一个犹太人，现在他给我寄吃的。问：苏联人不该这样做，你不为自己的将来想想？答：我想好了，以后我还要藏中国人。”老百姓被逼无奈去认同其他国家，这是苏共的耻辱，干群关系的恶化早就通过这些笑话传达出来，如果苏共早点认清现实，早点实行真正的改革，恐怕历史会改写。对比苏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回答响亮而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篇文章中说：“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从人民的利益和立场出发，迅速打出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组合拳。政治局率先垂范、徙木为信，清理腐枝败叶、编织制度笼子，干部舒适度剧降、群众满意度激升，好传统回归、坏习气鼠窜，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戴和支持。”

在全社会对风清气正的期待中，在重塑党风政风的信心下，这本书中的文章成为很多地方党组织和纪检机关教育活动的学习资料，在这样的案例教学中，很多同志反映“不打瞌睡了”。这样一本从历史中吸取反腐倡廉经验教训的书，其大受欢迎，来自于共识和信心，就像作者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是由大家共同书写的。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3期要目

本刊策划

领导干部心理健康与调适（共8篇）
胡月星　周　敏　李朝波　邵景均
赵福生　张素玲　苏曼丽　陶建平
徐如明　韩　阳　孙立樵

改革纵横

聚焦新药审批制度改革（共7篇）
张忠军　王若磊　张立伟　金成波
王雅琴　沈筱芳　李　红　王　勇

治党论苑

新官上任谨行慎初　甘学荣
构建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　林学启
管好用好退居“二线”干部　白双翎

经济视点

供给侧改革与民营企业发展　刘迎秋
优化我国外资金融规制体系　吴　彬　利　龑

社会治理

信访分类治理体系的困境与变革　田先红

热点观察

以“公开”确保“公正”　孔新峰
“回归群众”是群团组织改革的价值逻辑　刘　佳

学员观点

县域经济如何拥抱“互联网+”　冯忠宏
就地城镇化推动城乡一体化　沈晓红
县域社会治理的关键点　刘贤军
以改革创新促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　昌红梅

调查研究

从战略层面重视珠三角港资企业转型升级
中央党校第15期中青二班四支部珠三角调研组

地方探索

乡村治理呼唤科学服务
——以常熟中泾村为例　谢建刚　莫君伟

环球视野

转型社会的民生建设：俄罗斯的探索　朱可辛

舆情分析

大数据中的“春运潮”变迁
——中国舆情指数报告（2016年1月份）　百度舆情研究院
2016年2月网络舆情热点分析　李国祥　东　鸟